



Н. К. КРУПСКАЯ

JIAO
YU
WEN
LUN

克鲁普斯卡雅
教育文论

卫道治 译

湖北教育出版社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论

卫道治 译

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4印张 3插页 311 000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500

ISBN 7—5351—0397—9/G·333

定价：5.90元

目 录

教育问题的社会一面	(1)
实证教学法	(6)
在瑞士学校.(个人印象纪要)	(13)
论学校法庭问题	(18)
学生的自杀事件与自由劳动学校	(24)
对母亲的忠告	(32)
论学校自治	(36)
社会的未来.(五年办学经验)	(45)
谈国民学校的革新	(48)
一位法国教育家眼中的列夫·托尔斯泰	(51)
柏林德国教师代表会议上的劳动学校问题	(57)
谈学校自治问题	(70)
国民教育代表大会综述	(78)
彼得堡工人孩子的死亡率	(91)
致拟出版《教育辞典》的出版者	(95)
德国国民学校的“时代精神”	(99)
为人才开辟道路	(108)
论普及的统一学校问题	(122)
致全俄教师代表大会	(128)
保护少年儿童的劳动是工人刻不容缓的任务	(130)

市教育规划.....	(136)
《修改党纲的材料》一书摘要.....	(141)
争取青年工人.....	(144)
寄往莫斯科的信.....	(146)
怎样组织青年工人.....	(148)
1917年7月8日在彼得格勒第三次市党代表会	
(议上的报告.....)	(151)
无产阶级在国民教育事业中的任务.....	(154)
并非完全一致.....	(158)
维堡区管理局文教处.....	(162)
谈非宗教学校.....	(170)
怎样学习(致青年们的一封信).....	(178)
论青年共产主义者.....	(182)
关于柯捷列夫《职业技术教育》报告的提纲	
((在全俄第三次工会代表大会文教分会上的发言).....)	(185)
扫除文盲.....	(189)
书刊评论(《教育思想》).....	(192)
教师的集体组织者.....	(198)
儿童工作的方法(致俄罗斯共青团中央).....	(202)
书刊评论(《小学普通教学法》).....	(206)
国际道德教育会议.....	(211)
文化的基础.....	(214)
谈学校的宗旨问题.....	(216)
参观教学法.....	(218)
谈高等学校的改革问题.....	(225)
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	(229)

教师的集体经验.....	(238)
少一些鼓声.....	(245)
论反宗教宣传问题.....	(248)
论农村的文化工作(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会上关于农村工作问题的副报告提纲和副报告)	(252)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项遗训.....	(273)
教师的集体工作.....	(277)
《教育人民委员部公社学校》一书前言.....	(295)
农村和学前教育(在全俄第三次学前教育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99)
谈培养专业技术工人问题.....	(304)
青年农民学校的教育.....	(308)
在学校学习列宁和列宁主义.....	(317)
选择职业.....	(320)
学校自治.....	(323)
论儿童之家的劳动教学问题.....	(328)
普通学校的教科书.....	(333)
教科书的民主化.....	(338)
论农村的学前教育.....	(345)
国际道德教育第四次代表会议.....	(352)
青年农民学校的社会政治教育(在全俄青年农民学校 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355)
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365)
五年.....	(374)
论社会教育.....	(376)

列宁和学校.....	(381)
马克思的学说是苏维埃教师的行动指南.....	(385)
注释.....	(400)
译后小语.....	(443)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教育问题的社会一面

我国教育家总是喜欢责怪社会对教育问题漠不关心。他们历数我国学校众所周知的一些缺点，然后绘声绘色，大肆渲染，说什么从教育学的合理观点看来，这样对待学校工作实在令人齿冷；最后还向社会呼吁：应是清醒之时了！“社会应该更加关心自己未来成员的命运。它应该认真考虑我国学校的需要，探究我国学校不能容忍的缺点和错误何在并如何使之根除；最后，它应该认真考虑教育我国儿童的任务何在？”（叶尔米洛夫：《反对因循守旧》第3页，莫斯科，1898年）

有人认为，学校办理不善的唯一原因，在于社会没有树立正确的教育思想，要想纠正这一偏向，就得撰写一本教育学专著，详尽阐述夸美纽斯①、裴斯泰洛齐②等人的“金科玉律”。于是我国的教育家就煞费苦心去写这种教育社会的书籍。可是结局却为始料所不及：书是写了不少，也写得很好，但教育工作依然很糟。他们在想：原因何在？怎样才能做到家长阅读为他们所写的这些书时，不因其枯燥无味、毫无用处而弃置一旁？是否应该在中学开设教育学这门课？此外，还有应该考虑之处：是否还应再写一本书，详尽无遗地对各种教育规划一一加以论述，并且恳切陈词，指出社会应关心自己未来的成员，云云。也许，这样一来就会产生奇效了吧！

我国的教育学有一种天真的见解，就是认为教育思想是万能的。在我国许多教师的心目中，学校似乎是超越时间和空间

的东西；他们对整个学校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的认识也模糊不清。当然，如果你对一个教师说他把学校看作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东西，他会气急败坏地说你过于武断，竟然认为他不懂得学校与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起码的常识。但是，只要他提笔为文，立刻就怪论连篇，认为种种偏差之产生，都由于把夸美纽斯的“金科玉律”抛到了九霄云外。

为了使我们的读者不至认为这种相信教育思想万能、教育书籍万能的天真看法是我们幻想的产物，我们想在本文援引下一位可尊敬的活动家阿尔切夫斯卡雅女士^③的观点。

显然，她是坚信《人民必读》这本书乃是最近一段时期大力兴办星期日学校的一个诱因。

阿尔切夫斯卡雅在她为下戈罗德展览会（1896年）编写的关于星期日学校的小册子中说：“星期日学校的兴起，始于最近十年之间，正值报刊上大肆报道哈尔科夫星期日学校的消息以及哈尔科夫学校全体女教师集体编写的《人民必读》一书出版之际。”自此以后，星期日学校不仅出现于各大城市和省会所在地，而且也出现在各小城市甚至城镇和农村。”这真是奇怪的唯心主义见解：把一本书的出版看作一种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我们的看法却不一样。星期日学校的出现不是由于哈尔科夫的女教师们让社会相信这种学校的兴办是一大好事，而是由于群众渴望获得知识；而群众的这一愿望又是由于已经变化了的经济条件所引起的。《人民必读》这本书之所以风行一时，乃是由于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兴趣，即人民希望受到校外教育，产生这种兴趣的基础，也就是人民渴望获得知识。

同样，我国学校办理不善，社会只关心办得好的学校，我们也不责怪是社会对教育问题漠不关心，不认为这种冷漠态度

源于不懂得教育思想。我们主张更深入地去发掘社会采取这种冷漠态度的原因，那就是：在于社会条件。

至于社会对学校抱消极态度是不正常的，社会只有参与解决学校的一些迫切问题才能使学校从死气沉沉的形式主义和烦琐哲学下解放出来——对此，大家多少还有些认识。于是就对社会发出了这样的呼吁：要关心未来的公民！当然，这种认识常常是很模糊的，因此事情往往止于“恳切陈词”。这里有几个问题：能产生积极性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它是某一个阶级，还是国家全体公民的总和；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使社会直接参与解决教育问题，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来参与解决这一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问题虽然都是很自然地产生的，但我国的教育著作中却未及涉猎。

那么，又是怎么认识到社会对学校问题持消极态度是不正常的呢？

教育学与一系列迫切的社会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些社会问题就是来自狭义的教育学的。

就以中等学校的改革来说吧。目前提到首位的是这一问题的社会方面：中等学校的宗旨为何？它应采用何种大纲？无论你怎么削足适履地把中等学校的改革问题纳入纯教育学问题的范畴，然而，纸包不住火，这个问题的社会实质总要浮现在我们教育学这一池静水的表面而不会消散。

任何十个教育学问题都有这样一种社会性质，它是社会的每个成员都直接关心其解决的。这个成员的作用要象一个消极的旁观者那样，那就很明显地表现得不正常了。

有的读者不是教师，使他关心的正是教育问题的社会性质的一面，而另一面，即纯教育的专业性这一面，他却不大感兴

趣，比如，正象他对医学小册子一样。

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专门研究教育学，正如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研究医学一样，何况有的人与教育活动毫无关系，让他去研究往往属于纯技术性的一些细节，这样做也就没有目的了。

因此，如果一本教育学的书要写得使不是教师的读者也感到兴味很浓，那么作者就一定要指出这一问题的社会性质的另一面并加以明确地阐述。遗憾的是，我国这样的教育学书籍还寥寥无几。而一些为社会撰写的书，往往只是教育上的一些老生常谈的枯燥转述。例子俯拾即是。我们只想举出这方面堪称典型的一本书，即叶尔米洛夫先生所著之《反对因循守旧》。

作者在前言中首先就责怪社会的冷漠态度，然后声言，他的神圣使命在于“提出学校教育中最为迫切重大的问题，以期在反对因循守旧之风上为社会竭尽绵薄之力——此乃当代燃眉之急之重任矣”（见叶尔米洛夫：《反对因循守旧》第4页，莫斯科，1898年）。

这样一来，该书的对象就不是职业教育家，而是一般读者大众。这篇前言使我们有权期待：作者在提出一些最为重要的学校教育问题之后，会指出这些问题与我国社会生活的关系，并从社会的观点——予以阐明。然而，与其他许多教育家一样，作者只是在因循守旧的迷宫里转游，却未给读者任何新鲜东西……

该书提供了许多描述耸人听闻事件的短文。书中涉及到许多问题：既论述了记分和考试的弊端，又谈到了儿童懒惰的原因，历数了要求强化学生记忆力的害处，还讲到体育的必要性，儿童图书的选择，有表情的朗读，儿童的夏令营和远足旅行，乡村教师的地位，合理的语言教学，等等。每讲一条原

理，都引用了教育界名流泰斗的谈话。洛克④、裴斯泰洛齐、夸美纽斯、乌申斯基⑤、皮罗戈夫⑥、诺维科夫⑦、叶卡捷琳娜一世、别茨基⑧……应有尽有，无一遗漏。这一连串教育界泰斗的大名使读者为之叹服。他们一一念出这些名字，宛如淅淅沥沥的秋雨，而他们内心深处的惆怅迷惘，也有如阴沉晦暗的秋日。一切都黯然失色，苍白无力，要想通读全书，必须具备高度的耐心。尤其令人心烦的，就是全书无任何指导思想。书中没有任何透视可言，有如中国国画。作者声言要论述学校教育中最为迫切重大的问题。读者不禁大为迷惑地自问：按照叶尔米洛夫先生的意见，哪些问题是迫切重大的呢？是有表情的朗读和按照内容，而不只是根据装帧来选择儿童读物这个问题呢？还是社会参与解决问题和学校改革问题？该书语焉不详。没有透视，没有从社会的角度阐明问题。

叶尔米洛夫喋喋不休地讲着，最后得出了如下结论：

“末了，得出了一个不愉快的结论……一百年以前，当时的一些聪颖有识之士就已对那时教育中的烦琐哲学、形式主义和说谎欺骗的表现大肆鞭挞……而今如何？我们是否有所前进？”

可叹！前进有限。死气沉沉和说谎欺骗之风犹存，甚至可说是今盛于昔。

我们何去何从？只是从教育学上是找不到此问题的答案的。”（叶尔米洛夫：《反对因循守旧》第98页，莫斯科，1898年）

这一认识至为重要，本应以之为出发点。唯有一点令人难解：既然作者有如此见解，他何以要向读者倾注如此大量的教育学的老生常谈，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呢？！

或许，他依然执着地认为，只要写一本书，把一些伟大教育家的论点灌输给读者，情况就会好转呢！

实证教学法

今年（1910年），巴黎“社会知识高等学校”每星期四都举办一个讲座，谈运用实证教学法来讲授中等学校的各门课程（自然，历史，外语，语法，文学，数学）。讲座配以讨论。听众几乎全系中学教员及其夫人、朋友，另外还有少数小学教师，以及几个外国教师（多半是偶然来到巴黎的俄国人）。一位讲课的人说：“我们在此置身于自己人之间。”的确，这儿没有广义所谓的“群众”。无论是政府当局，抑或是一般教师，还有家长，都对这个问题全然没有兴趣。然而，实证教学法这个问题是与整个学校的工作方针紧密相关的，它所具有的不是狭隘的职业意义，而是广泛的社会意义，在法国尤其是这样；因为在这儿的教学中，因循守旧的势力已根深蒂固。关于法国中等教育工作的方针，我们从议会有关中等教育改革调查书上，发现了不少有趣的资料。

此项调查资料出版于1904年，有整整六卷之多。现摘录如下。

“我们当前采用之各种方法，质言之，乃是中世纪教学法之继续。当中世纪之时，教学完全掌握在天主教堂之手中。教师登上讲台，对端坐其下的学生所讲授的内容，乃是规定他们必学的东西。而学生则应视教师之讲解为金科玉律……天主教会教徒的思想以及他们的教育，对我们今日教育工作方针之影响极为深刻”（调查书，第2卷，第64页）。

尽管目前教学已完全摆脱天主教会之控制，甚至中学不再开设神学课，但是“死人抓住活人”，天主教耶稣会教徒的思想依然统治着当代世俗学校。教师往往是坚决捍卫世俗学校的，但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恰好是走的旧路子。他们所关心的是，培养孩子顺从听话、崇拜权威，扼杀学生的任何一点首创精神，不让儿童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对他们的一举一动的严加防范。教学局限于掌握已知的真理，批判的精神、探求的态度，在学校里都得不到提倡，逐渐也就被扼杀了。这样进行教学工作，其结果自然是难以令人满意的。

“有时不得不承认一些极为可怕的后果。有些可怜的候补博士，竟然对1870年的战争①一无所知，不知道梅次和斯特拉斯堡不再属于法国……此乃毫无求知欲之必然结果。许多青年人在国立中学毕业之后，往往很不愿意考虑进一步应学习些什么或听些什么课程；他们什么也不想看，什么也不想听。偶有所闻，即大为惊诧，尽管全系有关现代情况的知识”（调查书，第2卷，第34页）。

“应该承认，我们当前的教学不能充分适应时代的要求。它在一定程度上构成现代法国经济落后的原因。此种落后状况虽系相对而言，但如将我国工业和商业的缓慢进展与我们邻国（特别是德国）的飞速进展相比较，实足以令人痛心疾首”（调查书，第2卷，第439页）。

对学生的管束有时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举例言之，米施尔国立中学和拉克纳里国立中学位于市郊，其旁有风景如画的公园，但学生们课余时间不得在公园度过，只能在一个特定的游戏场所消遣，因为在这里易于对学生进行监督管理。若要进入公园，学生必须列队结伴前往——害怕他们破坏了国家的公

园，害怕他们行为不轨，造成恶果。

从来不许学生单独前往。

一位教师说：“有一次，我在班上做了这样一个试验：我对学生说：‘我想看看我能否信任你们，我要离开十分钟。我相信你们能够遵守规矩。’我这样做了。正在此时，学监来了。他对我说：‘您这种办法实在危险。您想想，如果你离开这当儿，某个学生突然把邻坐同学的眼睛打瞎了该怎么办？’我回答他说，我即使在场也不能阻止这个学生用钢笔扎伤他邻座同学的眼睛”。”（调查书，第2卷，第379页）。

许多教师都认识到了必须改变教学的性质和学校的制度，但他们在这方面无能为力。“当前，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中央政府之手，我们个人的主动精神已不复存在。部长对有关学校管理的一切细微末节均有具体命令”（调查书，第1卷，第559页）。

“在法国一切国立中学，学生均在同一时刻起床、就寝、用饭、学习和休息。各地均使用同一作息时间表，同一教学大纲，同一课表；从事同样的教学活动。一切规定都非常详尽具体”（调查书，第1卷，第38页）。

里彼①在1902年2月13日举行的下议院会议上说：“我们发现，我国各国立中学奉行的是一种集权制，它对一切小事都要进行官僚主义的干预，我国学校的领导人受命要发扬学生的主动精神，他们时时刻刻得到告诫：“要培养人才，唤起学生的责任感”；他们有如带着脚镣手铐的奴隶，被种种命令束缚住了自己的手脚。这些命令不是来自部里，就是来自区学监办公室。”

我不清楚，最近几年来法国各国立中学的教学方针是否有改变，但是，在参加“社会知识高等学校”星期四的讲座和

讨论会时，使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上述引文。

索邦国立中学的教师是采用比较合理的教学法的带头人，他们都是讲座的授课人员。几乎每次讲座都用各种事例来说明：教学大纲、课表、各项通令和考试等等如何束缚了教师的手脚。索邦国立中学教师布柳诺的讲课尤具特色，他讲的是语法课的实证教学法。他极其生动具体地指出，目前本族语教学中有 $3/4$ 的时间用于语法教学，而语法又局限于讲授书写规则（这些规则往往不是绝对的，何况很多都已过时）。他说，对于这种现状，教师实无力加以改变。他对听课的全体老师说：“我知道，你们都被考试、教学大纲、家长的要求和舆论束缚住了，我并不责怪你们。我只是想指出我们应努力以赴的前进目标。”

一位持不同意见的人向一位沉溺于改革幻想的讲课人着重指出，教师无力对现行教学制度作出任何重大改革：“您想对教学大纲作出重大修改，但是您忘了，我们都是听命于的人，上有领导，还有家长，此外还有各种考试，等等。我无论如何不会劝导刚刚开始自己教书生涯的教师在采用实证法上走得那么远。”他结束了自己的讲话，语多辛辣讽刺之意。

应该直言不讳地说，每个讲课的人都很谦逊，认为改革只具有狭隘的教育性质，没有一个讲课的人提出整个教学工作方针必须改革这一问题。

持不同意见的人也未超越对问题进行纯教育学的讨论的范围，大家讲话都很心平气和。发言的人限于教师，说话力求彬彬有礼，做出一种并非反对讲课人的意见，只不过稍作一点补充的姿态。我深感惊讶的是，这些活生生的法国人怎能如此漠然地对待这个问题。例如，布柳诺老师的讲授涉及到许多有

意义的问题，但没有人向他提出任何问题，也没有一个人发言。只有沙尔列马尼国立中学文学教员柳德列尔的讲课中谈到文学课上运用实证教学法时，由于有着某些独到的见解，这才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总的说来，他的讲课很有特色，我想多费一点笔墨来谈谈。

柳德列尔绝非一个平庸无奇的教员，他有高超的艺术鉴别力，博览群书，知识渊博，热爱自己讲授的课程，因此他讲起课来引人入胜。可以预言，教学大纲、考试，对陈腐章程的屈从，一定会把这位教师束缚住的。柳德列尔赞成采用实证教学法，这是顺理成章的。他在讲课时显得十分神经质，多少有点进行论战的味道。但是与此同时，柳德列尔毕竟是一位法国教师，他受到同行的偏见的影响，不想把问题充分地提出来，因而他的讲课也具有两重性，给人一种意犹未尽，考虑欠周的印象。

他讲课的基本思想是，对一些伟大作家作品的理解是一件真有很大主观随意性的事情。对一部分人说来，这些作品可能是言之无物的空话，没有唤起他任何的感情，没有在他心灵上留下任何痕迹，而对另一部分人说来，这些作品可能是包罗万象的世界，深深地激励了他的情感。不同的人对同一作品的理解存在着细微的差别。作品印象的力量取决于该艺术形象与读者本人亲历的相应印象能有多大的联想……对于一个从未见过大海的人，有关大海的艺术描写不会使他产生任何形象，而对一个长年与大海打交道的人，这样的描写就会使他产生鲜明的形象，就会通过一定的方式作用于他的心灵。对社会情感也是如此。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经验都知道，对同一作品在不同的年龄都会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作品未变，人却变化了，他的

感情变化了。艺术作品的价值在于，这一作品触动了人们什么样的心弦，使它发出了多强的振动。当然，首先得有此种心弦的存在，而且这些心弦能够发出声响。心弦乃是个人体验过的感情印象。这种感情的丰富与强烈的程度，决定着读者领会艺术作品美之所在的能力高低。

文学教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培养学生对艺术作品的理解力。达到此目的途径只有一条，就是尽可能让学生更多地体验相应的印象。这种想法是绝对正确的。但是，由于中学的学习脱离生活，学生所得到的与朝气蓬勃的生活有关的印象却少得可怜。

由此可以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现代法国的国立中学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造，必须转变为生产劳动的学校而与生活保持着密切联系。但是柳德列尔没有得出这一结论，他想在国立中学的文学教学中采用他所理解的实证法，这种想法也是很不确定、颇为勉强的。

柳德列尔以龙沙尔的诗《玫瑰》作为采用实证法进行讲授的例子。柳德列尔提出五月份讲这首诗，而从教学大纲的观点看来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大纲规定要在一月份讲。这当然须要改变。教师提出全班的10到12人中（当然，目前每班学生为40人，有时还要多些，但这是不符合要求的，应予改变），每人都要购买一枝玫瑰（所费无几）。购买时，要挑选最惹人喜欢的。然后，教师在课堂上与学生一起，依靠水彩颜料盒的帮助，来判断每枝玫瑰的颜色，接着再从形状上对每枝玫瑰进行品评。每个学生都要讲讲，他为什么特别喜欢他所挑选的这枝玫瑰。再让学生把这些玫瑰集成几束。植物教师从自然科学家的观点对玫瑰进行品评；图画教师让学生看著名艺术家画玫瑰